

SHIJI ZHUANXINGQI DE HUBEI SANWEN YANJIU



世纪转型期湖北文学研究丛书

刘川鄂◎主编

世纪 转型期的 湖北散文 研究

梁艳萍等◎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纪转型期的湖北散文研究

梁艳萍 李汉桥 阳燕等著

2011年5月

导 论

漫卷史书，惟楚有才。楚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地位，历来为湖北称耀。无论是先民神话、《诗经》二风（《周南》《召南》），老庄散文、屈宋辞赋、唐诗宋词、明清散文，共同构铸了楚文学辉煌的历史世界。由此可见，湖北散文在血缘上曾有过极其辉煌的历史渊源及身家显赫的文学家族。仅仅是屈子涉水化莲这一维，便足以渲染成为民族文化的主色调而彪炳千秋。

对于“散文”这一形态本身较为模糊的文学样式的界定，学界各家历来均持异见，虽然已有各位大家的高论言说，但是中国散文理论的体系建构依然处于尚未体系化、理性化、范式化的存在。有鉴于当下存在的情状，考虑到将散文梳理成为全方位、理论化的文本样式存在的难度和问题，本书所观照的湖北散文，仅以新时期以来学界基本认定的“纯散文”为主要研究对象，并未将报告文学、杂文以及各类文学小品容纳其中，作为观照对象。当然，我们也殷切期望，未来的时日能有机会对于曾经震撼全国的湖北报告文学以及相关创作进行系统的研究与讨论，以填补湖北文学研究实际存在的某些缺失与忽视。

—

中国当代散文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容，走过近半个世纪的坎坷历程。文学发展的动态过程必然伴随着历史、时代、社会的源流脉络获得同步发展。因此，从纵向的、发展的角度考察新时期湖北散文的发展态势，厘清来龙去脉，对整个中国散文史的建构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历时的统照下，湖北散文的演进过程呈现出以下三个阶段的基本理路。湖北散文始终以沉寂之姿努力地寻求新的发展前景，它的艺术生命力在创作队伍、作品数量、审美拓展上顺应了时代需求，形成了色彩纷呈的局面。

（一）传承阶段：集团意识的散文调式

湖北散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七年阶段，同全国的散文形态一样，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来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学意识放大到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与体裁，“左”的政治意识泛化为建设性的文化意识。在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历史环境与文学创作氛围中，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文学创作几乎趋于同一的颂歌体模式。选材皆以“国家大事”、“建设气象”入文，艺术构思以诗化抒情为基调，审美格调趋于格式化。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成为当时的散文范式。散文“诗化”、“形散神不散”成为重要的创作原则，过度地适应政治功利的要求，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追求意境形成了对于散文艺术探索的拘囿和规避。“形散神不散”的模式化倾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桎梏了散文艺术的创新性探索与散文审美创造力的提升，导致了散文问题内在的封闭性、审美层次的简单化与创作的模式化。

1966年之前的十七年期间，湖北散文的以“颂歌式”的写作——讴歌新时代、新社会、新气象、新人物、新事件为主调。作者“走遍了天涯海角，”也走遍了矿山、车间、水库、工地、鱼米之乡，经济作物的田野，自然它也走遍了学校，机关、街头巷尾^①”，歌颂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新生活景象。这一时

^① 茅盾. 反应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1960年7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J]. 人民文学，1960，（8）。

期散文创作的主要代表有碧野等。碧野的散文代表了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定时代散文创作的水平，堪与三大散文家杨朔、秦牧、刘白羽媲美，因而常被学界归于“杨朔式”即政治抒情散文之列。作为一个与时代同步的作家，碧野反映边疆风貌的散文集在当时十分引人注目，《天山景区记》、《边疆的春天》、《边疆风貌》、《在塔里木盆地上》等作品享誉一时。在新时期以后，碧野仍有《长江，母亲的河流》、《神农架之行》等作品问世，创作上强盛的生命力展现了他在当代散文史上的独特价值

1956年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知识分子如沐春风，散文的审美意识开始复苏，散文繁荣的外部条件基本形成。复兴五四以来的散文传统，创作新时代的“美文”成为作家的共识。在全国重振散文意识，提高散文艺术的环境下，国内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散文作品，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许钦文的《鉴湖风景如画》、方令孺的《在山阴道上》、丰子恺的《庐山面目》等佳作。湖北作家的散文作品值得一提的有白桦的《洛阳灯火》、姚雪垠的《惠泉吃茶记》、碧野的《天水景物记》等，为当时的散文审美与鉴赏起到了示范的作用。1956年出版的《散文小品选》中，湖北散文写作也成为这一风景中独特而重要色系。

1966—1976十年文革浩劫，对个体人性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摧残。革命样板戏将建国以来政治抒情热推到极致，完全驱逐了散文经典的抒情、性灵之魂。文革对知识分子造成的生命及精神的创伤，人类在苦难之后挽悼、怀旧的审美心理，促成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由“伤痕”到“反思”的发展轨迹。新时期湖北散文也难免历经这一过程。文革结束后，湖北老一代文学家，纷纷从伤痛中沉静下来，奏响回归者的心声，展开了对文革悲剧的血泪控诉。胡风的散文继承鲁迅的传统，对民族劣根性的强烈痛斥，展示了其作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战斗者铮铮侠骨；聂绀弩的散文中对封建伦理的抨击，对患难斗士的回忆，显示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赤子情怀；此外还有同因“七月”而光耀中国文坛的曾卓与绿原，他们的散文以艺术的笔调，真挚的感情，倾诉历经苦难与残酷的人生处境之后对温情与爱意的热爱。

随着文革的阴影渐渐沉淀，新时代多元自由的景象的到来，文学艺术渐渐走向了自足发展的正轨。新时期的湖北散文，个性化抒写性灵的散文悄然崛起。田野的散文是其中的代表，这位有着不凡经历的老作家，文革后致力于散文创作，连续出版了《相思曲》（1979）、《海行记》（1982）、《挂在树梢上的风筝》（1987）等专集，成为湖北散文群的中坚力量。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艺术创作的多元性选择，形成一个散文的高潮。在这个散文高潮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文化散文”这面大旗。而正是作为湖北散文又一中坚的王维洲率先提出了“文化散文”这一说法，延伸了散文创作的新的维度。《千佛洞夜话》、《少林寺秋游闲话》、《三峡猿声》、《仙佛寺香火》、《张家界的山、月、梦》鄱阳日出》等等作品却显示了文化由政治化走向多元化的散文观念的逆转，为90年代文化散文热开辟鸿蒙。

调整阶段：新旧美学传统的较量

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条件影响下，文学呈现向内转的姿态。读者的世俗化期待，以及创作者个性意识的复归，文学艺术呈现纷繁之姿。90年代以来的湖北散文也展开了它的“扩容”之态。作为中坚力量的任蒙，倾心于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取得丰硕的成果；作为湖北散文主力军的徐鲁和华姿，也在90年代完成了各自的创作转身。徐鲁从青春的歌吟转向书斋的沉思，写出了许多读书随笔；华姿将对宗教的虔诚之心植入哲理式的思考，写出了许多表达宗教与爱的主

题散文。散文新作《花满朝圣路》在充满追问与诗情的行文中，在宗教和哲学的氛围里，抒写着自然之爱、女性之爱和宗教之爱，表达着作者生命的欢欣和创痛。

进入新时代，湖北散文不乏求索与拓荒的先锋姿态。青年诗人张执浩的散文集《时光练习簿》被指认为“先锋散文”或“新生代散文”。对张执浩而言，散文可以更为直接地表达个体心性，是一种敞开自我的写作，他的散文作品清晰地映现了自己的身影、体验、记忆与感情。胡发云的散文总是能够从生命个体的存在状态中找到最佳的情感突破口和思想的阐述平台，奋力地去寻找现代人灵魂翔升与安妥之地。刘继明的散文作品以注重知识与思想含量见长，以一个写作者的身份对“写作”本身（包括文学、文坛、写作）进行清理与思考，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对社会和时代进行剖析批判。野夫的作品《父亲的战争》、《别梦依稀咒逝川》、《地主之殇》、《江上的母亲》、《生于末世运偏消》、《尘世挽歌》等，深受各方好评，广为流传。

新时期专门从事散文创作的沉河、王芸、席星筌、谭岩等人，在创作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成就写出来，很多开拓散文视界的新散文。沉河的散文集《在细草间》，把自己对生命个体、文学创作的理解和梦想投注到字里行间，尝试着将其对生命、生活和社会的思考纳入到一种对于现实的观照之中。记者王芸用敏锐的思绪触及对生命，主体的意识往往透过灵动的文字得到延伸。著有散文《经历着异常美丽》、《接近风的深情表达》、《怀旧的水潦濡湿琴声》、《期待的草叶蒙蔽了眼睛》等。席星筌立足于乡土散文的创作，其散文集《记忆与游走》将乡土情结浓厚地凝聚在他的笔端，他的质朴为多样化的文学样式提供自足的一维。而谭岩这位散落在民间的“文学穗粒”，有时更像一位隐士，勤奋的笔耕写出了大量历史文化散文与乡土散文，出有散文集《行走在人间》。

转换阶段：多元之态的酝酿与发展

湖北散文的另一维殊荣不容忽视，即大量以反串姿态创作散文的知名学者、小说家与诗人。他们在多个领域栖息寻找栖息之地，他们的深厚艺术修养恰恰符合纯散文注重学识、智性与文化意蕴各方统一的文类要求。

学者散文往往以其独特的内容显示着作者的人格力量、思想光辉与生命价值。这批学者里边有我们耳熟能详的涂怀章、可讯、李先坤、张永健、易中天、王先霈、聂运伟、刘川鄂、彭富春等等，他们以博大的襟怀、执着的精神，通过散文创作，承担起追逐理想、文化建构的启蒙工作。学者王先霈出版的《佛语哲思》睿智、豁达不失进取，飘逸不失敦厚，其中选择的都是经过时光之流淘洗之后留存下来的，因而有着较浓的书卷气息、文化意蕴的文化材料，和读者在品茗谈笑间，共同领悟探讨个中微言大义，获得超凡脱俗的情趣。在彭富春的散文中，我们除了可以读到他对智慧的探求，对人的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还可以见出他对家乡故土的深情，对父母兄弟的亲情，对家园的依赖。彭富春的文字中浸润着沉潜的情愫与缜密的思维，他将激情反复淘洗，沉淀下的是对人生的透澈了悟。刘川鄂、聂运伟等人的散文随笔则以学人的敏识与体悟游走于文学、求真、传道的人生存在，在诗意地栖居与审视的追问中行走。历史感和哲思性，力求在历史散文中找寻史与文的统一。

湖北的小说家散文创作者中不乏大家的身影，方方、池莉、刘醒龙、陈应松、邓一光、李建刚、彭建新、叶大春、黄宏猷、鄢国培、叶梅、岳恒寿、李书案、刘富道等等。这些作家散文数量颇丰，风格各异，为湖北散文的天空增添了亮丽的星云。方方的散文散文集《当代名家散文随笔系列——雅兴》、《阅读武汉》、《到庐山看老别墅》、《汉口的沧桑往事》注重历史感和哲思性，力求在历史

散文中找寻史与文的统一。池莉散文的散文以自传体为主，着眼于描写武汉小市民的生活状态，表达对生命的珍爱，其作品有《怎么爱你也不够》、《真实的日子》、《给你一轮新太阳》、《老武汉》等。刘醒龙的散文集《女儿是父亲前世栽下的玫瑰》、《一滴水有多深》，另在报刊杂志发表散文多篇，如《性感美国》，《与欲望无关》，《过去是一种深刻》，《听笛》，《城市两章》，《高山仰止》。乡村是陈应松《世纪末偷想》、《在拇指上耕田》、《小镇逝水录》散文写作的精神支点和精神家园，他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对社会进行着逆反现代性的哲学沉思和批判性诉求。湖北诗人的散文创作里，常见刘益善、谢克强、车延高、羊翠、管用和的散章。这些作家在文坛上以富有激情的诗歌而扬名，诗而优则文，他们游走于在“诗”与“散文”的世界，有机融合了诗歌的表现技巧和散文描写要素，大胆吸收两种文体的特质，营造出散文的超拔和灵性之美。

与小说、诗歌的成就的受宠程度相比，新时期散文的尴尬处境是人所共知的。湖北新时期的文学景象也是如此。作为文学大省的湖北，小说创作可谓“树树皆秋色”，然而“名家众多，大家何在”^①，一直存在着被人戏称“慢半拍”的现象。湖北的纯散文更是在这种尴尬的狭缝里畸形的喘息，它甚至从来没有获得过报告文学那样轰动的社会效应。但是它的周围仍然簇拥着大批偏爱它的作家和学者。尽管冷落寂寞，尽管只有少许的评奖，在当今这个缺乏耐心的浮躁时代，纯散文举步为难但仍不失希望的寻找着自足发展的新走向。

女性散文被划分为特殊群体展露于广袤的文学星空由来已久。如果非要为新时期的女性散文找到它的独立标识或者是文本权威的话，重感性、求精致一直是女性散文寻求的审美规范。而女性散文打上当代人深深的情感特征烙印走向个人化独语的倾向，恰恰在最显性的层面彰显了时代的风向标，预示了新一期散文美学规范的酝酿阶段的到来。散文不再集中反映某一人文传统，荫凉在某一集团意识形态的审美宗教下，而以一种世纪末华丽转身的姿态，昭示了新一轮价值崩溃、混乱和危机的时代开放、多元、复杂的价值体系和审美规范的激活与运行。90年代以来，湖北的女性散文创作主体大多更为纯粹地吐露个体于形形色色的生存境遇中所体验的小感触、小痛苦和小满足，有意无意的渲染一种附庸风雅的个人乐趣。叶倾城与麦琪是小女人散文的突出代表，她们善于表达在日常感受、时尚细节、风情遐思等现代都市文化中的种种情状，以独特的敏感、精致、优雅赢得许多年轻读者的喜爱。

暂不必深究当代散文这种多元的价值取向是否流于表面而缺乏深刻的当代性必备的精神内质。仅从形态上观照湖北新时期的散文发展动态，可以发现大量的纯散文在更广阔的文化的后花园寻找发展空间。此间，值得关注的还有周翼南源于其诗画合一的人生写照散文集《人物·山水·猫》、《从东方到西方》，以及袁毅走出书斋关注最朴实人们的草根情怀的抒写。另外，进入90年代以来，传统意义上客观的记录和叙述行旅见闻的行走散文，或曰“游记”，不再满足于将沿途散文见闻、景点风光、史传逸事粗糙揉合，而是将行走旅程中的见闻感触切入到自然和心灵之中，慧眼独具地以现代人的自由视角，表达人与自然或人与人之间的广泛联系，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穿透力。这一类散文里比较突出的有李建纲的散文集《斯德哥尔摩之旅》、范春歌的散文集《天歌难再》、罗时汉的散文集《孤云独去》、《一意孤行》、《孤帆远影》等。还有一种独具湖北特色的主题散文，近年来也受到普遍的关注，即一以古老三峡为探究对象的系列散文。三峡

^①刘川鄂，梁艳萍：华文文学巡礼⑧·湖北篇：在俗世中扬起沉重之翅——名家众多，大家何在？[N].羊城晚报，2005（3）

的风土人情在他们笔下变得绚烂多彩，富有情趣；三峡的青山秀水在他们的笔下变得旖旎多姿，充满魅力。如甘茂华诗歌般的鄂西风情，李华章浓郁的溱浦情结，杜鸿的三峡怀想，温新阶的乡村抒写，还有元辰（袁国新）和符号（符利民）的散文等等，这些三峡的歌者用他们的灵魂和作品来拥抱三峡，建构了“三峡文学”独特的人文风景。

二

从横向的、总体的角度考察新时期湖北散文的审美规范，对整个当代中国散文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湖北散文的艺术风貌，与湖北的地缘特征、历史机遇、人文传统是分不开的。于是，在共时性的视域概观湖北散文，总结其艺术建树与贡献，揭示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与误区，这种静态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新世纪，散文从多侧面、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着自然、社会、人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肯定“人”的地位，更深层次地进入对于人的、人类的、人性的前途、命运的思考，对于人的、人类的、人性的历史、现实、未来的求索。新世纪，散文不再是单一地反映时代精神，应和政治需求，阐释权利话语，或者只是表现自我，倾诉心底波澜，而是呈现着多元整合的审美态势。新时期湖北散文的审美态势也是如此，其间渗透着的哲思、智性与闲暇让读者从不同的维度去解悟它的真谛，寻求其美的内涵而获得艺术的享受。

哲思·文化

新世纪散文以独特的主体感悟力求重新认识历史、社会、人生、自然。深重的历史意识，鲜明的审美取向，热切的心灵呼唤熔铸了散文不同于以往又有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精神品格，直逼当下社会存在的人的心理、人的生存、人的权利和人的义务的哲学思考，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揭示存在，探索真理，使散文更富有生活实在性和哲理深刻性，强调普遍的永恒的情感和精神，展示了深邃的哲思美。当散文家以其知性的理思进入散文创作，着意于浩淼宇宙存在的探索，着意于人类生命历史是追寻，着意于现实生活的叩问，从而益愈趋近人类灵魂的特殊领域，他的思索就不仅仅属于个体，也属于人类整体。人正因为会思考，人才成为宇宙间最丰富、最美丽的生物

散文的哲思美，是浸融于散文艺术中的哲学思考，是对于存在世界的发现和真理的追索，也是散文艺术的升华。哲理以思索的形式进入散文文本，以本真的生命体验，以深邃的精神创造，以特殊的艺术魅力来表达创作主体对于世界、人生、艺术的执著追求，敏锐感悟，并视艺术化为生活、求知、处世的真理，使阅读——接受者在美的欣赏中感悟世界的奥秘，人生的真谛，自然而然地接受散文家的审美情感，并与之同构。

湖北的哲思散文主要体现在学者散文以及历史文化散文中。这一类人多数是知识分子或者是追求文化人格的代表。例如学者王先霈的《佛语哲思》散文集由宗教的根本意蕴——终极关怀出发，寻找生命的意义和真谛。王先霈引导读者遍看释迦牟尼、历代高僧、普通僧人之辈的死，让我们体悟到尽管人类的生命有限，然而只要能够达到“个人和群体的融合、个人和人类的融合，个人和宇宙的融合，这样也就有了不朽”（《生死事大》）。彭富春的散文集《漫游者说》以本真的生命体验，以特殊的艺术魅力来表达主体对智慧的探求，对人的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因为“希望自己的语言能够成为箴言，成为格言，它具有闪电般的力量，撕毁黑夜的幕帐”，彭富春踏上了寻找智慧之光的漫游者之路，在人生的旅途不停

跋涉，从不止步。“也许我是走在一条漫游者的路上，从江汉平原到珞珈山，从珞珈山到北京城，又到德意志大地。我有时在白昼中行走，有时在黑夜中摸索。道路有宽有窄。它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它也会形成一个圆圈，甚至会变成一条死胡同。我的漫游试图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一条无人走过的路。”从这些饱蘸真诚纯粹的情怀的笔触，我们分明见证了一个普通人的思想的成长经历和逐步逼近真理的艰难奋斗过程。任蒙的历史散文始终将“我”置于历史之间，切进历史人物进行感性的、审美的、艺术的解读，在人的命运、人的历史、人的文化之间追问，对人的关怀与追逐成为了任蒙的历史散文的主线。《凭吊赤壁古战场》，面对赤壁江水，他暇思：“假如那场激战不是在那个严冬，而是发生在我们现在到来的这种春意弥漫的时日，自北方而来的曹军战士，看到这山，这江，这田野，也许他们战死时会增添一分对世间的留恋。”徜徉在历史中的任蒙，诗兴与审美并重，于历史文化散文中展示了自己的个性。谭岩的《我们的遗址》不仅表达了对人的关怀，更表现出他对儒家精神遗产的高度重视、对魂灵和价值的苦苦追求、对已逝的“士”和“伊”的无限怀想之情。

智性·现实

文学从来就是一种智性的表达，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史。新世纪的文学更多的回归到现实世界，展开对当下社会生活批判与沉思。散文的创作主体凭借内心世界深深介入种种冲突，从而激起无限波澜来打发日子、寻觅理性、诠释人生。通过现实与心中理想的碰撞，产生回声，表现他们对人生命运的深情关注，体味跋涉在人生旅途中的独特感悟。

文学关注现实，旨在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回答社会问题，文学与现实的紧密关系维系着文学得以恒久的生命能量。社会价值多元化的今天，文学成为了从属于社会生活领域的创造性活动，社会生活为文学提供了营养之源，同时也是文学产品陈列的舞台。现实世界使文学摆脱偏安主体心灵一隅的处境，从自慰的文学、博物馆文学的走向智性的文学、大众的文学。真正的人生哲学在现实里，而真正的审美意趣在智性里，现实与智性的结合恰恰顺延了哲思的边缘，搭起了走向审美的虹桥。审美只能是人生的节日，在节日之余，在熙熙攘攘的生命尘嚣里，心灵与生活的契合，智性与现实的火花，才孕育出符合当代社会语境的文学精品。

新时期湖北散文的走向突出的体现了散文回归现实、抒发个体生命体验，重新找回个人价值的时代风尚。其中，小女人散文让自我充分渗入日常生活领域。在阐释细碎日常体验的过程中，升华了个体感受中的微观世界，放大了微妙错乱的小情绪。这一类散文往往细腻、精致、零距离贴近生活肌理，恰恰是这种细致、深入的观察与诉说，抓住了读者的敏感神经，使读者获得感官上的阅读乐趣。值得一提的是，通常被人们视为自恋的、自闭的小女人散文对现实的关注，局限于个体狭隘的乐趣，带有庸俗的将生活贵族化的气息。虽然后现代对人的推崇，以摆脱政治集团话语、还原人本身为时代指向标。所以，这些魅力无穷的带着人间烟火气息的女性散文，如果能够少一些虚幻，在思想性的维度上增加可读性，将获得超越性的升力。而一部分关注平民，抒发草根情怀的散文，正是将敏锐的目光凝注于那些奔走在城市大街小巷的朴实的人们，抒发着他们平凡生活的酸甜苦辣。这类走出书斋、触摸底层的散文写作者，与湖北地域文学中小说流行“写实”的风尚悄然遇合，与一般的底层写作不同，这类作品的视角比较开阔，虽然多少缺乏底层的深刻体验，但在艺术性与思想性方面高于底层抒写，笔触纹理间折射出智性的光辉。还有一些从诗画中寻找人生意趣的散文，无疑是智性与人生结合的典型写照。又如一些行走的歌者所吟咏的游记散文，这类游记散文将个体情感

倾注在对象之中，诉说的目的不再是单纯的经历复述，更多的在于个体精神的智性升华，品山川美景优美之余引发人们思考更多的问题，加深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再比如湖北一批小说家的散板，湖北小说有写实主义的创作倾向，大批的作家立足本土，发挥个体优势而登堂入室，进入知名作家的行列。这些跨界创作散文的写作者，在其行文中队湖北地域特色的人情世故的描摹与思考，处处绽放怀抱现实、睿智生存的光芒。

散文作家对现实的关注，通过智性的表达，发掘他人所没看到的东西，完成自我期待和价值判断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迎合了普通读者的审美需求。可以说，这些散文将现实人生拉上艺术的舞台，将耳熟能详的社会现象逻辑化，理出所以然来，使现实人生闪耀着理性的光辉。我们在关注历史、解释文化，苦于形而上的高度不可企及时，不妨回到对当下存在世界的关注和解释，同样可以相遇智慧的火花。无所谓现实残酷、理想光明，在这些智性光辉的掩映下，现实变成了充满意味的游乐场，时间百态，全部跳跃在沧桑之外。

闲暇·审美

闲暇是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年前就提出的美学范畴。亚里士多德由审美出发思考闲暇，在亚氏看来，“哲学的智慧适用于闲暇时期”。孕育了优游性的闲暇是艺术创造的必要条件，也是艺术产生的社会根源。有闲暇，才会有纯粹的艺术创造，也才有纯粹的艺术鉴赏和艺术享受。“人的本性谋求的不仅是能够胜任劳作，而且是能够安然享受闲暇……闲暇是全部人生的唯一本原。”（亚里多德《政治学》）当代德国哲学家约瑟夫·皮珀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闲暇是文化的基础。”可以说，“闲暇是一种包容着智慧、中庸、愉悦诸文化因素的高尚的精神生活，是把特定历史时间的真善美溶为一体的自由境界”，（邹贤敏《闲暇与觉识—亚里多德美学思想拾遗》）

“许多伟大的真知灼见的获得，往往正是处在闲暇之时。在我们的灵魂静静开放的此时此刻，就在这短暂的片刻之中，我们掌握了理解‘整个世界及其最深邃之本质’的契机。”（约瑟夫·皮珀《闲暇：文化的基础》）。就世纪末散文而言，闲暇之美集中地体现于作者可以从自由地撷取世界、现实、人生的一景，在对象化的过程中昭彰主体，在审美愉悦时用心于智慧。不仅可以从自己身上看到对象，而且也在对象中间找到自己，达到审美的无目的的合目性。它更富有生活实在性和思想性，更强调一种普遍的永恒的情感和精神。浸透于散文中的往往是人生的悟识，智慧的凝聚，理性的追索和心身的愉悦。

闲暇“是一种投入于真实世界中，听闻、观看及沉思默想等能力的表现。”（约瑟夫·皮珀《闲暇：文化的基础》）。闲暇美，是新时期湖北散文向纵深拓展的方向，是审美散文建构规范不可忽视的精神内质。体现闲暇这一审美特质的散文，集中在一批先锋散文、新散文及诗人散章中。“闲暇的态度不是干预，而是自我开放，不是攫取，而是释放，把自己释放出去，达到忘情的地步，好比安然入眠的境界。”（约瑟夫·皮珀《闲暇：文化的基础》）

具有闲暇美的散文有王先霈的《佛语哲思》、王芸的《给每一座山每一条河取一个温柔的名字》、刘继明的《武汉的文人》、谭岩的《望断南飞雁》、张志浩的先锋散文、席星荃的乡土散文、沉河的散文……这些散文从多个侧面展示了自由的灵魂对情、理、爱、欲的感知、体验和思索，他不凭于外物，而是一切由己的心灵，既有鸿鹄大志“论道经邦”，又从心灵深处细秘思虑，求自由、平等、

博爱于人间，觅真情、智慧、宽厚在笔下，表达出深刻的人类内在意识和精神旨向。这种浸透着“闲暇”的审美态势，是散文的此在。

“要达到闲暇的境界并非依赖极端的努力，而是某种‘引开’的行为（但是这种‘引开’的行为却要比极端的积极努力还困难。这种行为会更困难，主要因为它不容易主宰，全然的努力状况比放松和超然的状况更容易企及得多，即使放松和超然不必付出什么努力。这听来似乎有些矛盾，但事实却是如此，闲暇是一种人性的状况，同时也是一种超人的状况。”（约瑟夫·皮珀《闲暇：文化的基础》）。可以说，新世纪散文还没有完全达到审美意义上的闲暇的境界。散文作家对于现世尤其对于低层的关注不够，即使关注了，其中的疼痛又过于诗意化了，散文所描摹的“痛苦”更多的现出一种创作的乌托邦的幻象。“缩短每个人的劳动时间，使一切人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来参加跟整个社会有关的理论和实际工作”（《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到那时创作主体才能以一种直面的姿态去释疑真相与苦难，将生活的本真从生命躯体中剥离出来，用以表现自己对描写对象至乃整个人类社会和宇宙的认识，“闲暇”的自由王国才得以建立。我们期待那一天。

三

本书致力于新时期以来的湖北散文形态研究，试图通过个人专论的形式，主要以散文文本的视角探讨每个散文创作者的审美创作特性，继而由文本语境向个体生命情致生发，系统的对这个问题进行透视：湖北的散文写作者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些思索着和行动者。这种从微观的角度入手把握宏观发展趋势的研究路径，是梳理散文史纲、探索散文理论发展规律的必备之路。源于这种对地域性文学发展进行总结论述的可能性与局限性，本书所作的章节划分，在尽量避免杂乱的基础上难免陷于偏执，因此本书的章节安排旨在寻求一种条理性而非刻意增加归纳的难度。散文的庞杂分类历来是学界对其进行研究的一大阻滞，本书纳入编内的审视对象仅限于湖北的纯散文创作，这也是散文范畴论研究中，散文文体逐渐剔除杂类、净化文体，不断强化自身独特性、自觉发展性的当代散文概念寻求安放之地的建设性要求。

地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底色。对本土的关注，对地域特色的关注，一直是中国文学易于忽视的一维。我们在讨论“新时期以来湖北散文”的命题时，恰恰提请且在一定程度上愈合了新世纪文学研究的这一缺失，强调了地域文化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我们期待着，在全球化的今天，在眼观宏旨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去路上，有更多立足于行政地理领域的文学整体观照，相信在这种区域定格的高度重视下，各区域比肩行进，全面的文学整合才能在严格规范的基础上发生质的飞跃。而散文这一文类的史论与理论建构对这一环的依赖尤甚。另外，在当今体制化的文学格局里，不同区域内的作家对所属体制的认同感，总是冥冥中影响着自身的创作，无论这一体制的干扰强还是弱，这都说明在中国的文化机制内，对地域性文学形态的细致整合，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其现实意义的。犹如一个创作个人对某一流派或者社团的归属，或者说是某一个个体对群体的崇拜，个体之杰总是在群体之雄的肩膀上，更容易立足。我们期待在湖北这块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沃土上，作家群体之雄肃然崛起，个体之杰傲立群雄。

目 录

导论：湖北散文的历史进程

第一章 回归者的心声：湖北老一代文学家的命运与坚守

- 一. 独立的人格建构——胡风散文论
- 二. “雪风大吼终难掩，中有悠悠赤子心”——聂绀弩散文论
- 三. “人性”抒写的柔韧与坚硬——曾卓、绿原的散文创作

第二章 彰显“纯散文”之大器：湖北散文的中坚

- 一. 从“杨朔模式”到自我的回归——碧野散文论
- 二. 散文的“迷失”与“回归”——田野散文论
- 三. 深沉凝重的诗意抒写——王维洲散文论
- 四. 从青春的歌吟到书斋的沉思——徐鲁散文论
- 五. 宗教性的表达与爱的抒写——华姿散文论
- 六. 当追问与沉思相遇——任蒙散文论

第三章 先锋的姿态——湖北散文的样态

- 一. 呼唤心灵与守望生态——胡发云散文论
- 二. 野夫：谱写尘世的挽歌——野夫的散文论
- 三. 精神喧嚣的疏离与批判——刘继明散文论
- 四. 城市蜗居者的诗意虚拟——张执浩散文论

第四章 天穹闪亮的星光——湖北新散文巡礼

- 一. 倾听心灵的声音——沉河散文论
- 二. 游历与感受——王芸散文论
- 三. 谭岩：隐士的书与画——谭岩散文论
- 四. 记忆与游走——席星荃散文论

第五章 沉潜于多元的现实之美——湖北散文的多棱镜

- 一. 诗画合璧：周翼南散文论
- 二. 草根情怀：袁毅的散文
- 三. 女性散文：麦琪与叶倾城的散文
- 四. 回溯时光的使者——朱朝敏散文论

第六章 学人的哲思与冥想——湖北散文的新维度

- 一. 洞察与会心——王先霏的随笔
- 二. 穿行于临界的漫游——彭富春的随笔
- 三. 自我持存的个体言说——刘川鄂的随笔
- 四. 走进历史之纵深——李辉的随笔

第七章 越界的笔致——湖北小说家散文

- 一. 世言心语——方方散文论
- 二. 世俗生活的激情与珍视池莉散文论
- 三. 朴实、真挚、高贵的精神追求——刘醒龙散文论
- 四. 让乡村成为写作的精神支点——陈应松的散文论

第八章 诗意的延伸——湖北诗人散文

- 一. 情满山水——刘益善的散文论
- 二. 生命的盐——谢克强散文诗论
- 三. 车延高的散文

第九章 怀着乡愁寻找精神家园——湖北主题散文概览

一、行走的风景：

- (1). 智者的游历与观思——李建纲的散文
- (2). 独行中的人心与人性——范春歌的散文
- (3). 找寻历史的文化回音——罗时汉的散文

二、三峡的歌者：

- (1). 三峡的游思——李华章的散文
- (2). 吊脚楼的守望者——甘茂华的散文
- (3). 人生路上的智慧寻觅——元辰的散文

第一章 回归者的心声——湖北老一代文学家的命运与坚守

侧耳凝听，时隔多年仿佛依然传来那蹒跚而又坚定的足音——这是回家的脚步。然而世事沧桑，家园又在何处？只有“回归”本身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中最后的希冀。他们个人的受难，代表了知识分子群体一个时代的受难。面对着这样一群柔弱的生命，让人困惑的是，这究竟是时代的玩笑还是命运的困顿？历史在用粗暴的姿态鞭挞着历史的菁英；这究竟是荒诞的故事还是曲折的传奇？驯服式的改造却锤锻出愈加坚韧的灵魂……历史的吊诡让一切变得难以言说。然而，他们毕竟光彩夺目地划过昨夜的星空，让人瞩目和永远铭记的不仅是卓著的贡献，还有苦难的历程。这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不仅增强了中国文学的底气也丰富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建构。

这就是回归者以及他们的文字——苦难的岁月、坎坷的经历，甚至是凄风冷雨，都不能磨蚀和改变一个人内心的纯洁。无论是胡风的“侠骨柔情”，还是聂绀弩的“赤子之心”；无论是曾卓“温情”地抒写，还是绿原“冷峻”地思辨。他们所有的情感和感动，他们胸中翻腾的黄河和长江，都源于一颗质朴而又崇高的心灵，面对这一群时代精神的执火者、世纪的歌手、提醒者、目击者和某种证词提供者，我们将因为曾与他们同行而骄傲。

一. 胡风和他的散文

一个作家应该有主体意识。刘再复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作家最重要的，应当有自己的心，有自己的灵魂，有自己的人格。”胡风的一生是抗争的一生，既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又和国民党政权斗争，在左翼作家内部和新生政权里也不能取得和谐。在他身上不仅有着湖北人的火爆脾气和固执个性，而且还显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顽强的人格精神。

傅光明曾在《胡风散文》的《前言》中这样写到：“胡风是人如其文，也文如其人的。读本集中的理论和杂感类文字，会感到他惯常的面孔：刚硬，有棱角，摸上去真扎手；深邃，有内涵，读进去有韧劲。而读他的纯散文作品，我竟读出往常不知的一面：侠骨，有血性，一副义气肝胆；柔肠，有情愁，颇具丹心豪情。”^①应该说，“侠骨”与“柔情”，构成了胡风人格精神的重要两面，他用他的文字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刚硬又不乏柔情的文艺家形象。正是通过阅读他为数不多的散文，我们时刻能感受到这些文字中涌动着一股“独立人格”的精神气脉。

一、人格的“刚硬面”

胡风既是“五四”时代启蒙精神的继承者，又是“后五四”时代启蒙现实主义的坚守者。当我们解读胡风的人生，发现他作为一位来自民间、有着极强独立精神和现代大众意识的精英式知识分子，既继承了鲁迅式的批判性传统，同时也接受了鲁迅式独战方式，他的“不识时务”和耿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不能见容于国民党政权，在五十年代又不能见容于主流话语，似乎也就成了某种必然，最终导致了他和“七月”派作家群在时代转换中被冷落以至在“在这光明的际会中死去”（艾青《向太阳》）的悲剧命运。

^① 傅光明：《胡风散文》，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如果我们将时代环境下的失败看作胡风“独立人格”精神的失败，是不明智的。历史终究会证明这一点，胡风坚硬的性格与原则的坚守是缺一不可的，它们在时代的炉火中锻造了一位独特的现代人格的知识分子。

在胡风的创作活动中，“启蒙精神”与“现实主义”构成了胡风“硬性”散文的两大主题。

首先从“启蒙精神”的角度来看，作为“后五四”时代的执旗手，胡风传承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神。他主张文艺应该医治民众“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具有改造国民性的功能，提出了“精神奴役创伤论”。有学者这样评价胡风，说他是一位以鲁迅所开创的五四启蒙精神搏击历史和黑暗现实，感受人生和心灵苦难的艺术家。在他的散文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精神的表现：一方面，他注重对鲜活的个体生命的关注。在《半仑村断想·想到几个小故事》中他思考了几个“所谓小儿女的故事”，虽然在别人看来是“上不得台盘的”，但在他看来，与其听有些人嘴里说着“节义”“廉耻”，滔滔不绝地登台演说几小时，“倒不如这类小故事反而能够使我感到活人底意义，活人底平凡的意义和非平凡的意义，就说这伟大的解放战争罢，能够支持下来而且一定要胜利，难道不是依靠着我们民族底意志和人民底气节么？”在文章结尾，他总结道：“肯定人民底生活实状，肯定人民底对于生活的忠贞，综合这些，用科学的精神寻出现实历史底特征和发展方向，向伟大的理想引着走去，这才叫做民主。”另一方面，他的启蒙观表现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胡风认为文艺的作用不在于向民众灌输某种具体而现成的政治观点，而在于强化民族精神，医治民众“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激发其生命的“原始强力”。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他更偏重于把群众看作改造和教育的对象。在纪念五四的文章里我们看见了胡风对五四革命传统的眷念。也看到了他发现的“市民阶级底另一个灵魂，怯懦的妥协的根性”在文学上的反映：“于是，认识现实的精神变种成市侩式的商场机智和淑女绅士底日常腻语，自我扩展的精神变种成封建才人底风骚和洋场恶少底撞骗，而五四当时一般所有的向‘人生问题’底深处突进的探究精神，却变成了或者是回到封建故园的母性礼赞，或者是把眼睛从地下拉到天上的流云似的遐想了。”（《文学上的五四——为五四纪念写》）这里以讽刺的手法，揭露出这种劣根性在文学上的表现。

其次，从现实主义创作角度来看，作为一个接受过五四文学传统熏陶的知识分子，胡风直接传承了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胡风把作家对客观存在和自我的认识统一起来，强调了作家对于社会和自己的双重责任。这是承接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文艺观和人生观。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他扛起了五四文学的旗帜，站在左翼文学阵营中，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政策和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进行了广泛锐利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对以林语堂和周作人为代表的“论语派”、小品文流派的所谓“闲适”、“超脱”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将革命现实主义精神与创作和评论相结合，指引着左翼文学行进的方向。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他坚持着自己一贯的现实主义原则，不愿去迎合主流文坛文学只能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艰难地在“忠实于自己”和“认识客观现实”之间行进。即使在“归来”后，在胡风的许多回忆文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对冤案相关人物和自己文艺思想的阐述，在与文坛隔断多年后，他依旧坚持自己一贯的现实主义原则。在《我为什么写作》一文中我们又听到了他倔强的声音：“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为了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争而写；为了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向和革命的胜利而写；为了有益于人民解放、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而写；也为了探求文学发展的规律，阐明它内容的精神力量而写。”

正是对“启蒙精神”和“现实主义”的坚守凸显了胡风人格精神的“刚硬面”，有评论者称胡风是一位硬气文人，他的这种“刚硬面”既造成了他的人生悲剧，同时也完成了其个人的人格塑形。李辉曾在《风雨中的雕像——关于胡风的随感》中也谈到：“也许他有太多令人非议的性格特点，譬如说偏激，譬如说不宽容，但他做人的根本原则是正直、真诚。他从来不愿掩饰自己，他把虚伪视为人格的天敌。他的性格使他招致厄运，但他的性格也使他做一个真正的人。”^①

二、人格的“柔情面”

如同一个硬币拥有两面一样，胡风除了在散文中表现他的硬骨头精神，细细品读他的散文，我们也会发现他内心深处的那一丝侠骨柔情翻看胡风的散文集，有些发黄的纸叶间布满了战斗的记录和奋不顾身的影子，但一个完整的人远远不止这些，在与现实和灵魂的搏斗和撕扭之外，那些面对友人、妻儿与人民的文字，一股温情流溢其间。

胡风曾经强调，艺术（文学）作品的内容一定是历史（社会）的东西。离开了人生就没有艺术（文学），离开了历史（社会）就没有人生。而人生不是空洞、抽象和单面字眼，它蕴含着人类的丰富与多样的情感。所以他说：“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的确，有爱亦有憎，它们共同支撑起完整的人生，而作家是上帝派下来的使者，是扑扑跳动的良心，来揭示所有的隐秘。

胡风散文中“柔情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是战乱时期的感慨之作。他在战乱中辗转于重庆，上海和香港的途中写下的《人环二记》（《出西土记》和《浮南海记》），《出西土记》写于民族战争结束后“复员”之前，《浮南海记》是在反动统治将要崩溃，从上海出走后记下来的。在中国现代历史中，这两段历史是至关重要的，胡风一改往日犀利，锋利的笔法，在文章中流露出对友人，对妻儿的关心与留念，也写出了自己在出走的途中的无可奈何，从侧面表达了自己对当时的时政的不满，看似平淡朴实的文字，却蕴含了默默温情。

另一方面表现在对于友人，对于人民的关爱。他用无比的真诚来拥抱人民，比如对老舍“真”的赞赏与评价（《我与老舍》）；对东平牺牲的悲痛的悼念（《忆东平》）；对日本思想战士宫本百合子坚强的肯定（《越过大海和火网的悼念》）；对被俘的中国朝鲜志愿兵与敌斗争的高度赞扬，感动于他们的宁死不屈，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的忠心（《肉体残废了，心没有残废》）；对解放以后工人以及劳动模范的赞赏，深深的折服于他们克服艰险的英勇经历和忠于人民忠于党的坚贞情操（《伟大的热情创造伟大的人》）等等。

最后，他的这种情感还表现在对于他的“精神导师”鲁迅的崇敬之情上。胡风在他的散文中一方面展示了鲁迅式的嬉笑怒骂，展示了鲁迅所代表的独特的战斗精神，这是与他刚硬的性格以及坚守现实主义的原则相印证的，但同时当他面对与鲁迅的交往，面对先生的辞世，他的笔端流露的是默默的温情与高度的对先生的崇敬之情。他用自己的笔来悼念先生，如《悲痛的告别》中他告诫朋友们“凭我们的爱心、我们的悲痛、我们的仇恨所融合起来的伟力”继承先生的志愿；《即令尸骨被炸成了灰烬》中回忆起突接先生辞世消息的震惊，默默发誓用先生永不泯灭的精神鼓励自己继续前行。

胡风的这类抒发内心感受的散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展示在文艺评论中的

^① 李辉：《李辉文集·文坛悲歌》，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版

硬汉形象不同的胡风，但是这类展现侠骨柔情的文字正是他内心深处情感的外露，同时也让我们更进一步的理解了胡风的独特的人格魅力。“恨之深，爱之切”，因为对于民族劣根性的深切痛恨，所以他关注弱者，关注生活在祖国大地上的这一群善良的人们，他不仅启发他们，更用自己拥抱真理与信仰的真诚来拥抱人民，无论是自己的友人，妻儿还是普通的人民大众，他都心怀真诚，用自己最柔软的文字来表达对他们最坚硬的爱。

无论是刚硬还是温柔，无论是横眉怒目还是侠骨柔情，都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了胡风的独立的人格魅力，他可以在他的文字中尽情地嬉笑怒骂，展现喜怒哀乐，因为他的精神是独立的，他的文字是独立的，他的人格是独立的！这种独立的人格精神实际上代表了作家在创作所孜孜以求的境界。这对 20 世纪前叶的中国文坛无疑是有着深刻的意味的——在他胡风散文中所体现出的这些品格不容置疑地构成对新时期散文精神的大胆预言与深情呼唤。

“时间开始了！”仿佛听到作者发自内心的呼唤，摩娑着《胡风文集》发黄的封面，我们盼望着，一段真诚的时间真的开始了……

【作家简介】

胡风（1902~1985），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湖北蕪春人，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20 世纪 30 年代曾任“左联”宣传部长，抗战期间，主编《七月》杂志。解放后，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全国人大代表。50 年代其文艺思想遭到批评，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领导人，79 年获释。其主要著作有诗集《野花与箭》、《时间开始了》，文艺评论集《文艺笔谈》、《密云期风习小记》、《论民族形式问题》，散文及杂文集《棘源草》、《人环二记》、《从源头到洪流》等。

二. 聂绀弩及其散文

论及中国当代散文文坛的湖北作家，读者不会对叱咤在文坛中又活跃在当代政治舞台上的蕪春作家胡风感到陌生；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在同一个时期，湖北的京山小镇孕育了一位同样饱经沧桑、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他就是聂绀弩。

1903 年的除夕，湖北京山县城关十字街聂宅迎来了一个新生的男孩，家人祝福这个孩子将来能够出类拔萃，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取名国樑，他就是后来活跃在现代文坛上的散文作家聂绀弩。也许是上天对他的垂青，也许是命运给予的考验，这个出生在交子除夕的男人注定要经受严冬中大雪风暴的冲刷和春寒料峭的洗礼，注定要在黎明前的暗夜中争取最终的光明：他目睹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风雨飘摇，见证了中华民国短暂的由民主革命走向伪民主反人民的穷途末路，他曾经热情憧憬新中国百废待兴的美好未来，也亲身体验了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无情摧残。出生在书香世家的聂绀弩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国学教育，18 岁他进入上海高等英文学校读书，不久就开始接触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讨论集》、郭沫若的《女神》等这类进步书籍，19 岁加入国民党。1924 年，他成为广州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的第二期学员，次年获得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苏联求学期间，他不仅自修了中国文科大学的主要课程，接触了各种中国当时前沿哲学政治学著作，还接受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思想的熏陶。聂

绀弩的求学经历使他增长学识和文化底蕴，更为他建立独立坦荡正义的人格，树立民主主义的革命理想和共产主义信念起到了催化的作用。聂绀弩的散文记录了中国民族战争、民主革命的动荡与转变，反映了中国从封建社会被强行拉入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阵痛与挣扎，映射了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肩住黑暗闸门的人文良知。

揭露封建制度与文化对中国妇女的摧残与戕害，争取妇女的平等与解放是聂绀弩散文的一大主题。“妇女的品种比男的多，除了妻、母、婢、妾，等等一般性的外，有偷过人的、改过嫁的、经过刑狱的、在外面单身流过浪的、被强奸过的……”，但是不论怎样的妇女，也不论她逃到哪里，对妇女的压迫、虐待、轻视、玩褻便到了哪里，而且更令聂绀弩心疼的是，“对妇女实施这种种行为的，甚至是妇女自己。”^①在封建社会乃至到号称民主的民国时期，妇女从小就被设定、被培养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完全按照他们的要求来塑造自己，这种行为不仅仅是一种被迫的无奈，甚至已经沉淀于女性的无意识深处，成为了她们的自觉。她们以“贞静顺良慈淑端俭”为美德，以《列女传》《女诫》《女训》《女孝经》《家范》《内训》《闺范》为修身课本，以服从父母夫婿甚至儿子为行为准则（《女子教育一文献》），以成为别人宜室宜家的贤妻、太太、小妾、准太太、超太太甚至什么都没有的外室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从桃色太子看旧中国》）；社会，或者准确的说是男性审视女性是否优秀的标准并不是才学能力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而是容貌是否漂亮（《体貌篇》），是否是处子（《“确系处女小学亦可”》）、是否能够低眉顺耳宜室宜家；万一不幸女人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被人压迫诱骗沦落风尘，或者因为战乱失去贞操，甚至命运多舛丧夫或因生活所迫改嫁，那么她们就堕入了阿鼻地狱永世成为人们谴责唾骂鄙视欺凌的对象不得翻身；要是他们僭越了社会的规范识得几个字，明白点事理、要求点平等自由，走出家庭在社会上谋得一份工作，或者偶尔得到丈夫的尊重，那便是大逆不道，丧失母性的表现，是阴胜阳衰男人怕老婆的反常现象，引得道学家“知识分子”的扼腕叹息、普通人的莫名惊诧和耻笑。

正是女性的命运如此的不堪，聂绀弩才忍不住为女性挣得应有的权利大声疾呼，他认为女性获得平等自由与尊重、走出家庭参加社会活动并不会使女人丧失母性，母性本来就是女性与生俱来的，女人解放只会使得社会进步更快、文明发展更迅速，还会使母性的关怀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上去，进而得到更大的发扬，何况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听说过男性因为“主外”而丧失了“父性”的；女人之所以会成为男人的附属品，甚至沦落风尘并不是她们自甘堕落，而是因为社会的不公，男性对他们的戕害与玩弄造成的，妓女不是恶之花，而是文明的怀疑者、错误牺牲的受难者（《论娼妓》）。聂绀弩所欣赏的女性是自然健壮的农妇，是《自由引导人民》中表现的那样的圣母，是活跃在瑞金的挑起生活重担、拿起武器自卫、勇敢的走向未来的娘子军，是出走家庭的娜拉，是冲破礼教条条框框追求两性自由的《聊斋》中的侠女。聂绀弩深信，只有女性自重才会赢得社会的尊重，只有打碎束缚女性的礼教枷锁才能使女性获得自由，只有张扬女权男女平等才会换得社会的飞速进步，只有女性的地位提高了，民主才会完整，国家才会文明。聂绀弩是“五四”以来女权主义的忠实旗手。

文学从来不是社会革命运动的工具，它也不能承担起改造社会的责任，但是优秀的作品会把握住社会重要思潮的脉搏，展现它本身的思想内容和内在价值。民主革命进程中旧观念和新事物的齟齬，腐朽谬种和进步因子的碰撞，都成为了

^①聂绀弩：《蛇与塔·自序》第1页，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